

企业血本治污彰显社会责任担当

邓子庆 职员

2月15日记者获悉,经过5年研究和摸索,宁夏天元铝业集团投资15亿元的水泥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。令人意外的是,该项目主要目的是解决工业废渣污染问题,而非博取经济利益。(2月18日《新消息报》)

就在日前,有两则新闻引发广泛关注,一则是中石油下属分公司因违规排污被环保部罚款50万元人民币。据悉,在近几年的环境污染以及环保排放未达标黑名单上,中石油、中石化这对“石化双雄”却仍旧屡屡榜上有名。另一则,沈阳市某村一条长河因为企业违规排污而寸草不生、恶臭不

止,导致很多村民都考虑逃离该地。很明显,“石化双雄”尚在环保问题上屡犯众怒,那些唯利是图的中小企业“肮脏不堪”更是见怪不怪了。

必须指出的是,企业解决污染环境问题的,往往非不能,而是不为。以“石化双雄”为例,尽管它们在中国屡上黑名单,但人家隶属的海外炼油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却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。由此可见,从技术上解决石化企业带来的污染并非难事。不管企业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有多复杂,有一条铁律是始终存在的,即企业逐利而行。

正所谓天下熙熙攘攘,皆为利来利往。

市场经济下,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,商人角色决定它们的最大追求始终是经济利润的最大化,而从眼前来看,环保投入对于企业而言,无疑是累赘,不仅不能快速创造现实利益,还会挤占企业扩大生产方面的投入——企业利润与环保成本类似销售商品与售后服务的关系,但凡一心追求经济价值者,无不希望商品尽快出售出现而不再拿钱出来搞售后服务。很多媒体就曾报道,不少企业买回治污减排设备仅仅是为了装门面,只在应付检查时才煞有介事地让它运转一下;有些企业则更出格,什么环保设施都不用搞,直接将污水废渣偷排偷掉了事。

正因如此,宁夏这家企业下血本解决污染问题,不仅罕见,更是着实让人心头一热。毕竟,15亿元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,都非小数目,更何况,这个血本不是拿去博取更多经济效益,而是投入利国利民环保事业。“如果要长期发展,环保含糊不得,因为明天被淘汰很可能就是因为今天舍不得。”该企业老总的这句话,不但证明了其深刻认识到注重环保事业将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,更体现了企业人的社会责任担当——一家企业在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,还该尽力取得品牌、美誉度、社会形象、社会责任等的最大化,这就需要企业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,由“经

济人”向“社会人”转变。

说到底,企业要讲社会责任,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,不能一味为了经济利益而损害社会利益,甚至做违法乱纪之事。注重环保,就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的道德血液。值得一提的是,一个企业若天生具备道德血液自然更好,但这种自律并不十分可靠。事实上,宁夏这家企业下血本治污的原因之一就是“安全风险和环境风险常常被各级管理部门关注”。因此,在赞扬企业主动下血本治污的同时,更需强调政府层面对企业的法治监督,以倒逼所有企业担负起相应社会责任。

愿“处长搞死老板”的悲剧不再发生

龙敏飞 媒体人

原中国最大民营航空公司东星航空总裁兰世立曾为湖北首富,2010年4月被法院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刑4年。东星航空随即被破产清算,超百亿资产化为乌有。他在监狱内曾举报时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,如今出狱后的他接受采访时称,“在落后地方,老板再大,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。”(2月18日《新京报》)

在我们的理念里,“市场的归市场,行政的行政”是最起码的市场秩序。不过现实的情况,或许不如理想那般丰满。近日,兰世立出狱,在接受采访时他无奈地表示,“老板再大,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”,这话在基层、在落后地区,绝对不是一句笑话,而是一句大实话。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就曾表示,企业家要“在商言商”,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其本份。“企业家的本分是做好商业”,这似乎道出了简单的真相。

不可否认,我们一直在简政放权,去年7月,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

审批项目等事项,共计50项。而类似的动作也是频频发生,今年简政放权的节奏依旧没有放缓。不过,这些良愿在一些基层执行时,却走样变形。据悉,兰世立当年因为审批问题,4架飞机在法国晒了半年太阳,最终损失达到2个亿,这就是典型的负面案例。而在经济领域,越暴利的经营项目,准入门槛就越高,拿着公章的处长,卡一天还是卡一年,似乎都是他的个人权利。这样的现实境况,见证了市场氛围的尴尬。

与此同时,我国税负过重也使得一些企业尾巴不干净,留下了一些把柄。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曾在多个场合表示,“如果说现在让我办一个企业,社保费率占工资的50%,再加上所得税等,肯定会倒闭,90%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可能会倒闭。”周天勇说的就是“中小企业”,但一家企业成为大企业之前,必然先是“中小企业”,那要发展下去,在税负是不能承受之重的氛围里,自然只能选择偷税漏税。而一些地方也知道这背后的市场规律,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如果二者相安无事倒好,如果企业有异动,早年的“偷

税漏税”就会成为企业前进的墓志铭。

在这样的现实境况下,有“处长搞死老板”之说便不足为奇了。而对于这句话,我们也需要“说者无意听者有心”。毕竟,这样的市场氛围是不合理的,也是急需改观的,那市场便需要进行改革升级,以减少行政权力的过分干预。对此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亦多次强调,“市场能办的,多放给市场。社会可以做好的,就交给社会。政府管住、管好它应该管的事。”由此可见,让“市场的归市场,行政的行政”这般意识,早已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共识,那接下来任务,便是执行与监督的问题。

因而,要避免“处长搞死老板”的悲剧发生,就需要从两方面入手:一方面,政府应积极减免赋税,给中小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更多的发展舞台,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市场氛围;另一方面,则是继续推进简政放权,“市场的归市场、行政的归行政”不能仅仅停留于“纸上谈兵”的阶段,而必须照进现实,尤其是要照进落后地区。唯有如此,健康成熟的市场机制与市场氛围才会形成,“处长搞死老板”的闹剧才不会发生。

“天女散钱式营销”散尽了广告伦理

李英锋 律师

为博眼球,2月14日下午,河南信阳市羊山新区苏博楼企房展广场一房企上演疯狂一幕,半空中狂撒10万人民币,结果大部分被风卷走,多名市民在争抢中受伤。(2月17日新华网)

又见以大把撒钱为噱头的广告把戏,而广告主又是房企。这种营销方式既是疯狂的、刺激的、诱人的,也是拙劣的、恶俗的、危险的,触碰到了法律底线,散尽了广告伦理。

诚然,钱是房企的,房企有支配钱、赠与钱的权利,但是,人民币是一种特殊的财物,受到法律的专门保护,权利人使用人民币要守规矩。《中国人民银行法》第十九条规定:禁止故意毁损人民币。《人民币管理条例》第六条规定: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爱护人民币。房企从二楼或三楼往下撒钱,是对人民币的亵渎,由于当天风大,从楼上撒下的钱很容易被风吹走,从而造成人民币的流失或损坏。显然,“天女散钱式营销”有违法嫌疑。

另外,“天女散钱式营销”还抛弃了广告伦理。《广告法》第三条规定:广告应当真实、合法,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。第七条规定:广告内容应当有利

于人民的身心健康……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……不得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情形,不得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。首先,撒钱式营销会引发人们的哄抢,进而引发踩踏、撕扯、交通拥堵等行为,影响观众人身安全,也会妨碍社会公共秩序。其次,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“文明”,而撒钱式营销充满了铜臭味,是一种恶俗误导,是不文明的,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,违背了社会良好风尚。

“天女散钱式营销”也难以提振房企的经营业绩,它的广告吸引力和实质的影响力是剥离的,也就是说,很多人到现场抢钱,只是奔着钱去的,抢没抢到钱、抢到多少钱并不会影响人们的购房意愿,想买的人还是不想买。当然,撒钱式营销还会通过媒体、网络等媒介产生扩大传播效应,但更多的受众只会把它看做一种新鲜事、一种茶余饭后的花边新闻,并不会真正关注广告的核心内容。房企撒了大把钱,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,反而会换来反感、厌恶、质疑、讽刺,甚至会挨骂,这钱撒得岂不是太冤了?希望各企业以后都不要再干这种费钱不讨好的蠢事了。

“四个零”迈出了出租车改革的重要一步

郭文婧 自由职业者

湖北省襄阳市新组建一家国有出租汽车公司,统一经营新增的500辆出租车。与原有1700辆出租车维持挂靠经营模式不同的是,新公司在经营管理“零挂靠、零承包、零班费、零份子钱”的基础上实行考核制员工管理模式,真正做到公车与公营。(2月14日《长江商报》)

近年来,出租车行业面临着严重的双重矛盾,一是传统挂靠经营模式下,高份子钱,低社保,导致劳动关系不和谐,动不动就出现司机罢运的现象;二是在出租车司机感慨赚钱难的同时,市民又纷纷抱怨打车难,所以各地的出租车起步价和里程价又纷纷上调。横亘在矛盾中的根本问题,在于出租车定位不清下的垄断经营,而高昂的“份子钱”就是最直接的原因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襄阳“四个零”的考核制员工经营模式,积极意义就不言自明。

实行“零挂靠、零承包、零班费、零份子钱”基础上的考核制员工经营模式,对出租车司机来说,降低了所承担的经营风险,也让劳动收入、社会保险、休息休假等

等有了基本保障;对出行的市民来说,也简单将权力与义务直接与出租车公司对接,发生纠纷解决起来更简单,拒载、绕道等不文明现象有望得到切实遏制。

出租车行业之所以长期普遍实行挂靠经营模式,而不实行员工管理模式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运营成本的控制和司机积极性的提高问题。办法总比困难多,襄阳在改革同时,还研发出了一套高度集成、便于操作的出租车信息综合管理系统,可以实现公司对车辆运营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时段的监控,还获得了国家专利技术。同时,构建了工资分配、安全管理、营运服务、车辆技术、员工管理等配套制度,从而将员工管理与考核挂钩。

我们在为襄阳改革叫好的同时,也不得不指出担忧所在。由于出租车政府特许经营的本质没有改变,员工制的出租车公司也有逐利的冲动,加上新组建的出租车公司是国有公司,这就可能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民打车难问题的基础上,带来更大的要求调价的压力。如果不能真正做到外部独立审计、成本完全透明,即使进行

听证,也难以消除社会对涨价合理性的质疑。

我国出租车经营的根本问题,就是因为定位不清下的政策和垄断,导致出租车行业成为一个“寄生”的行业,忽视了出租车驾驶员的经营本质。导致的结果,一方面是出租车行业不需要高新技术投入和巨额资金,出租车公司通过寻租特许经营权获利,“份子钱”和不和谐的劳资关系便随之而来;另一方面是政府在获得特许经营权拍卖收入和一定税收的基础上,却让出租车公司成了最大的获利方,导致社会各方都怨声载道。

因此,出租车行业改革的正确方向,就是应该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,厘清政府、市场与社会的边界,放开特许经营权,完全放弃“份子钱”的制订和监管,在保证出租车公共交通清晰定位的基础上,实行完全的市场经营,通过税收和保险来进行宏观调控,让各类性质企业和个体承包者自主经营、自由竞争,让各种经营管理模式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襄阳的改革也只能算是迈出了改革的重要一步而已。

戏·画·闲·言

审批竟须盖百章

吴之如·文并画

新华社报道,海南省人大代表那治川在海南“两会”上“晒”出了他制作的“行政审批长征图”。长达5页的A3纸张,详细记录着一个投资项目从获得土地到办完手续,需经过30多项审批,盖上百个章,全程最少需历经272个审批日。

办一个项目,仅仅审批手续就得苦等至少272个审批日,如此效率,恐怕还真与改革开放的精神对不上号。某些部门官僚作风之盛,由此可见一斑。不用说,此类现象与当前现代化建设形势的紧迫要求是格格不入的。

人民对于执政者的施政期待,除了清

正廉明之外,还要求遵循科学精神,讲求效率。假如公仆们都习惯于循旧例慢条斯理拖泥带水地办事,很可能消磨掉大好时光,让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白白溜走,而贻误了建设美好家园的大业。这样的经验教训,并不鲜见。有道是:

手续复杂路漫长,审批竟须盖百章;施政当思创新策,删繁就简好主张。

想来审批公文上的百个公章中,有些并非是万万缺不得的。有关部门何妨就此多作调查研究,找出予以精简改革的路子。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,浪费公款物资是极不应该的,浪费人们的精力而拖累建设速度也是极不明智的。因此,理顺工作环节,提高办事效率,是一条相宜之路。

批量强制关停须有利益协调机制配套

叶雷 自由职业者

1月14日,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大东鞋业的一场大火夺走了16条生命。地方政府展开整治行动。差不多一个月不到的工作日,关停鞋企4559家、出租私房3805家。2月17日,数千中小鞋企业主围在温岭市横峰街道政府门口,抗议政府在“1·14”火灾后,强制关停鞋厂。(2月20日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)

前面有大火夺走16条“生命”的教训,现在这些中小鞋企存在有消防设施不合格、无证经营、营业场所建筑违法违章等问题,所以才有接踵而来的“强制关停”。表面上,温岭市政府的做法不仅可以理解,而且也应该为这种坚决执法的精神叫好。然而,存在各种问题的鞋厂之所以达到数千家,并且生存这么多年,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地方政府过去在执法方面的长期不作为,而今却要这些企业主自吞苦果,当然也是不合理的。

这些业主之所以围堵政府,除了媒体报道的“我一家就靠这个吃饭生存”的现实理由之外,网上传播更多的是两个质疑,一是检查不合规,有违法违章问题,可

以要求停业、要求整改,为何要被强制切断电源、强制关停?二是过去要么不管,要么罚款了事,现在出了事情就一棒子打死,这和收保护费有什么区别?简单地说,在这些业主要为自己的违法违章承担后果的同时,政府及其相关人员也必须为过去长期的不作为承担责任。

关停鞋企4559家、出租私房3805家。简单按照三口之家折算,就涉及到25000人的生计问题,如果算上雇工,数量将更大。虽然相对拥有100多万人口的温岭市而言,确实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。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,哪怕只是关系到一个人的利益,政府也要考虑。法律无情亦有情,无情是有法可依、执法必严,有情就是要有协调各方面利益的自觉意识,要积极预防社会内部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,从而保证社会和谐稳定。

在这方面,武汉市的“禁麻”是有经验和教训的。被称为“麻木”的人力三轮车,虽然是违法营运,但在上个世纪末曾是武汉独特的街景。1997年,武汉市采取强制式的行政收缴,结果不仅“猫捉老鼠”,而且警民冲突不时发生,甚至引发车主上访,静坐,游行。但是2003年,政府再

次出手,在给予8000元赎车费、安排工作或一次性给予4000元自主择业补贴的同时,增加城市的士数量,降低起步价,结果很快就平顺解决。

就温岭的中小鞋企来说,他们关注已经发生的火灾,也不希望自己的鞋厂成为下一个,但为了生计,为了赚钱,他们会抱有侥幸心理。而对政府来说,更多的就是只看到了上次火灾的教训,只是害怕再次发生之后的问责。正是因为没有利益协调的交集,所以才有批量的强制关停,才导致数千业主围堵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发生。虽然对这种围堵政府的行为,可以以法律的名义强制解决,但却解决不了政府的公信和威信。

对一个地方而言,法治秩序的建立,是靠持之以恒的有法可依、执法必严而形成的习惯和信仰,而“运动式执法”恰恰与此相悖。正因为如此,政府必须通过一定的利益协调机制来为过去的不作为、失职埋单,也必须从此告别“运动式执法”、“选择性执法”,用严格的常规执法来形塑这个地方的法治生态。因此,温岭的“运动式执法”,起码在“依法行政”的基础上,不能无情操作,而应该主动考虑利益协调机制。

